

# 论古巴“革命”

西班牙共产党(马列主义)机关刊物《西班牙革命》

(*Revolución Española*)

1973 年

国际激进运动 译

1956 年的古巴革命把卡斯特罗推上了台，它的发生和发展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走向社会主义的人民革命。

1956 年 12 月的古巴起义不是由一个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马列主义政党领导的，因为当时古巴根本还不存在这样的政党。古修(人民社会党)多年以来就执行一个反革命政策。1938 年古巴“共产党”领导人就和独裁者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勾结起来，在他的内阁里弄到几个部长职位。在 1944 年的总统大选中，他们支持独裁者巴蒂斯塔的总统候选人卡洛斯·萨拉德里加斯，而反对反帝的候选人拉蒙·格劳·圣马丁。在那些年，人民社会党领导集团盲目追随主张取消共产党，鼓吹劳资调和，坚持可能“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美修白劳德的理论。在 1950 年和 1951 年，人民社会党和巴蒂斯塔联合庆祝“五一”节。在哈瓦那塞罗体育场的主要演讲者有巴蒂斯塔的阿尔贝托·萨拉斯·阿马罗和人民社会党的拉萨罗·培尼亚。巴蒂斯塔政府在美帝指使下发动政变前几天，《今日报》上登出了一张占整版篇幅的照片，表现巴蒂斯塔和阿尼瓦尔·埃斯卡兰特在“共产党”机关报编辑部内的情景。1955 年人民社会党通过科斯梅·托里恩特领导的一个号称“共和国之友”的资产阶级组织，参加了美国-巴蒂斯塔搞的选举骗局。因此，当 1956 年 12 月起义运动爆发时，人民社会党在其报纸《每周来信》上把起义运动斥为“冒险”，并坚持反对，在这种条件下，古巴革命的领导权落到了一伙激进民主主义者手里，即落到一个小资产阶级革命集团“七·二六”运动手里。菲德尔·卡斯特罗当时的思想(包括在他上台相当一段时期内的思想)是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左翼基督教社会党的思想”。在那个阶段，卡斯特罗，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和他们的战友代表农村小资产阶级群众，既反映了这一部分劳动群众的反抗精神，也反映了他们的动摇和不坚定性，而不是反映无产阶级的精神。当时巴蒂斯塔和帝国主义的宣传机构所以把卡的游击队叫做“共产党”，仅是因为反动派和帝国主义把一切反对他们利益的政治运动都称做“共产党”，哪怕它们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运动。

研究了古巴革命最初几年的动摇和不坚定，菲德尔主义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性质也就清楚了。卡上台的时候，让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今天的美帝代理人乌鲁蒂亚担任国家元首，并且对米罗·卡多纳之流的“民主人士”委派高级职务，此人后来成为美帝头子约翰·福·肯尼迪在迈阿密搞的一个反革命委员会的头头。第一个土改法是巴蒂斯塔倒台后六个月才颁布施行，是资产阶级式的土改，是不彻底的，虽然和以前的半封建大庄园土地制度相对来说是大大前进了一步。菲德尔主义第一次土改的打击对象是最大的庄园主，把面积超过 402.6 公顷的庄园大部分充公了。那次土改的缺点和不足在于：

一、剥夺大地主财产时给予赔偿(这和卡里明修正主义分子在其纲领中建议的一样)，即意味着那些一辈子凶狠剥削雇农为生的残酷的地主可以拿到一笔丰厚的赔偿金，从而继续在国内或流亡国外过奢侈生活。另外，古巴政府付出的这笔巨款取给于财政收入，是劳动人民的血汗。

二、仅仅剥夺多于 402.6 公顷土地的庄园，这是够宽的了，但是，还允许很多例外，某些经营得法，生产率高的地主可以继续拥有其经营的产业，最多可达 1342 公顷。

三、至于被剥夺土地的地主，不是剥夺他们占有的全部土地，而是剥夺 402.6 公顷之外的多余土地，也就是说，他们仍旧占有大量土地，仍然是庄园主。

在第二次土改和最近一次土改留到后面再谈。卡政权最初几年在古巴采取的其它革命措施，就其性质来说，从来也没有超出民主革命的范畴。这些措施是针对扼杀古巴的美国托拉斯和依附帝国主义的大买办资产阶级。古巴革命初期没有采取针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任何措施，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在古巴这样的国家里，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应该分为几个前后衔接的阶段来实现，第一个阶段的革命对象不是民族资产阶级，而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地主和大买办资产阶级。应该批评的只是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不够坚决，动摇不定，这说明了革命没有一个无产阶级的马列主义的领导。而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领导。例如古巴对美国垄断资本采取措施前曾犹豫再三，举棋不定，只是因为帝国主义封锁和打击古巴，才毅然下手，作为报复。由于这种敌意与日俱增，迫使古巴领导人(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本性妨碍他们大胆发动群众，自力更生建设独立的国民经济)倒向社会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强大的压力使菲德尔不得不在投降和走社会主义道路之间作出抉择。同时，古巴人民内部的斗争正在发展，民族资产阶级脱离了

革命阵营，站到反动派的一边，为他们效力。为了挽救其政权和对付民族资产阶级，卡斯特罗不得不给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一个打击。另一方面，这也是劳动群众和被剥削者的要求，卡斯特罗一伙由于失去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也不得不越来越依靠劳动群众和被剥削者。除此之外还要加上另一个重要因素。

卡斯特罗集团把“七·二六”运动和声名狼藉的修正主义的老人民社会党合并，成立了统一革命组织。这是大杂烩式的合并，不是思想上的联合。因此，修正主义政客(布拉斯·罗加、胡安·马里内略、阿尼瓦尔·埃斯卡兰特、拉萨罗·培尼亚、毕金·奥尔多基等。)控制了统一革命组织和政府机关。虽然人民社会党的前任领导人和菲德尔主义者之间也有矛盾，但后者总是动摇和软弱。例如，阿尼瓦尔·埃斯卡兰特以搞阴谋和个人野心被谴责后，尽管人民要求枪毙他，却批准他跑到布拉格去避一个时候，事后回来又去外交部担任了一个高级职务。

老人民社会党的修正主义政客把持了国家机关，并在统一革命组织里(后来改名为古巴共产党)成为苏修统治集团无条件的代理人。他们推动卡斯特罗进一步乞求苏联政府的保护和“援助”。老人民社会党修正主义政客开始给古巴政府的声明增添了点“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使古巴革命新阶段更具有社会主义的面目。当然，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外表并不确切符合现实。卡斯特罗政府1963年10月3日颁布第二道土改法令时(大部分农村资产阶级倒向武装反革命的事实迫使他们这样做)，没有动那些拥有土地不足五卡瓦耶里亚(即67.1公顷)的富农。剥夺农村资产阶级的土地，也和对待地主那样，是给予补偿的。在颁布第二道土改法令时，卡坚持“古巴革命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兴趣通过合作化把个体小农经济改造为集体经济”(古巴修正主义头目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语，见《古巴第二次土地改革》一文)。这就意味着卡拒绝在农村经济中实行社会主义。今天古巴10%的可耕地还是富农占有，他们中间的很多人根本不事劳动，完全靠剥削短工的劳动生活。工商业的社会主义化也是通过购买进行的，这就使资产阶级得以作为剥削阶级继续存在。另外，没有建立由集中规划控制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而实行一套将古巴引向资本主义复辟的“自负盈亏”的修正主义办法。

因此，古巴革命从资产阶级民主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是前后不衔接的，是局限的和片面的。卡斯特罗集团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根源，它的非无产阶级本性，以及它于1961年秋突然表面上“转变”为马列主义所表现的局限性、前后不衔接和流于形式，这一切基本上说明了这个集团后来为什么走上修正主义轨道：因

为它不可能充分发动群众，也不可能采取自力更生的原则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它越来越紧密地依附于苏联领导人。

1962年10月出现了所谓加勒比海危机。卡斯特罗错误地屈从赫鲁晓夫的要求，允许苏修在古巴建立战略热核导弹发射台，美帝的罪恶头子，早在1961年4月就组织过对古巴奇诺斯湾入侵的约·福·肯尼迪利用建立导弹基地的借口，搞了个明火执仗的强盗行动，封锁了古巴。赫鲁晓夫在三番五次否认在古巴建立了远程导弹基地之后，突然答应撤出导弹，事先并未征求卡的意见，并且允许美国海盗监督和检查苏联船只。赫鲁晓夫还企图强迫古巴损害民族主义，接受美帝操纵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在自己的领土上进行监督。

面对赫鲁晓夫之流统治者这种无耻的背叛，卡的反映应该如何呢？正确的反应应该是毫不含糊地揭露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背信弃义、改弦易辙，不要苏联的“援助”，要自力更生，并且同世界革命的主要堡垒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强关系，同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及全世界所有马列主义革命者加强关系。但是，卡不是这样做，却走了一条痛苦的错误道路。在1963年的头几个月，他对苏联统治者还提出过一些软弱无力的批评并重申武装斗争的原则。但是在1963年春天访苏期间却来了个大转变（当时正是以中共为首的马列主义者和以苏联赫鲁晓夫集团为首的修正主义者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激化和四处蔓延的时候）。在这次旅行中，卡在苏修的经济讹诈面前完全投降了，并且同苏联站在一起，反对中共的马列主义的革命立场。在卡斯特罗同赫鲁晓夫签署的联合公报中，“古巴方面”（即卡本人）明确地肯定“完全（！）赞成苏联的对外政策。”在1963年5月23日于莫斯科发表演说时，卡贩卖了各国人民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解放和对抗帝国主义的修正主义论调，并且美化赫修领导集团。例如他说：“通过我们代表团这次访问苏联，帝国主义看了苏共、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对古巴革命的声援达到何等地步……历史上再也找不到另一个相似的榜样。这是国际主义。”这样，赫鲁晓夫在加勒比海危机中恬不知耻的行径，在美帝的虚声恫吓面前丢人的屈膝投降，背叛古巴人民，以及对哈瓦那政府狂妄的言行，这一切，在卡看来却是声援的榜样，却是国际主义。而更加登峰造极的是，卡在结束讲话时说：“我在结束讲话之前，不能不表达对我们两国人民友谊的不倦缔造者尼·谢·赫鲁晓夫同志最深厚的感谢。我们古巴人要感谢他，因为无数声援和友好的表示都是出于他的主动。”这个高谈阔论的小丑、反革命阴谋家、“和平共处”和“苏美合作”统治世界论的

头号吹鼓手赫鲁晓夫，被那个自称“拉美革命领袖”的人阿谀奉承，捧到天上去了。

自 1963 年夏天起，卡斯特罗集团走的道路是越来越滑向赫修的泥坑，我们可以指出他们迈上这条道路的几个步子。

——卡斯特罗 1964 年 1 月 2 日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明明白白地重申他要追随苏修的和平共处政策。在 1964 年 1 月又一次访问苏联的时候，卡斯特罗和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签订一项公报，公报原文这样说：“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赞成苏共中央为消除分歧，加强国际共运队伍的团结合作所采取的措施。”简而言之，卡斯特罗赞成并公开支持尼·赫鲁晓夫集团对中国共产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其他马列主义政党以及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所进行的分裂和破坏的罪恶活动。

——华金·奥尔多基案。他是修正主义人民社会党的旧头头、著名的中央情报局特务，和马科斯·罗德里格斯一起受到谴责，但远远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反而有希望得到修正主义者的宽恕。

——1964 年在哈瓦那举行的拉美修正主义党代表会议。参加这个大会的有下列臭名远扬的叛徒：阿根廷的柯都维亚，智利的科尔巴兰，巴西的普列斯特斯，哥伦比亚的维埃拉·怀特和乌拉圭的阿里斯门迪等……人数占绝对多数的马列主义共产党，像秘鲁和厄瓜多尔共产党，都根本没被邀请。在这个会议上，卡斯特罗在修正主义同伙的面前为帮助过“分裂主义集团”（即革命者）而做了“自我批评”。不用说，那次会议做出的宣言也是最腐朽的修正主义货色。

从这时起，卡斯特罗同拉美最坚定的反帝革命运动断绝了一切联系，停止了一切援助，相反却完全支持那些跟着苏修指挥棒转的人。例如：在智利修字号党的第 13 次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夕（尽管这个党的领导集团是最腐朽、最反动、最声名狼藉的国际修正主义集团之一），卡斯特罗同路易斯·科尔巴兰（智利修正主义的最高领导者）签署了一个联合声明，“肯定”他的臭气熏天的论调。

——古巴领导人参与苏修的分裂主义阴谋活动，并且参加了 1965 年 3 月 1 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分裂会议，这个会议是世界共运分裂的决定性标志。

——卡斯特罗在 1965 年 3 月 13 日在哈瓦那发表的演说中赞成苏修领导者鼓吹的“联合行动”，主张停止修正主义者与马列主义者之间的公开论战，当时，

正是论战的形势开始对挑起这场争论的修正主义者不利的时候，他们急于停止论战。

——利用哈瓦那三洲会议达到颠覆马列主义政党的修正主义目的，并通过分裂主义达到破坏革命斗争的修正主义的目的。为了阻止参加会议，他们做了无数肮脏的勾当，不但把马列主义政党拒之门外，而且把那些不听从修正主义指挥棒的反帝运动也拒之门外，卡斯特罗甚至不让已经抵达哈瓦那的玻共(马列主义)代表团参加会议。于是，玻共(马列)同其它四个革命组织一起组成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代表团，它们自动退出会议，以示抗议卡斯特罗这种不堪言状的做法。(相反，玻修叛徒代表团却出席了会议。)会议期间，多米尼加人民运动(直到当时还在马克西莫·洛佩斯·莫利纳的领导下执行一条革命路线)代表团由加耶塔诺、罗德里格斯率领，他和卡斯特罗合谋要在多米尼加人民运动内部发动修正主义的“政变”，他在回圣多明各后实现了这个阴谋，从而把多米尼加人民运动变成古巴修正主义的附庸。后来，在马克西莫·洛佩斯·莫利纳同志被非法排除出党以后，多米尼加人民运动积极地参加了帝国主义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骗人选举，使特鲁希约的继承者华金·巴拉格尔合法地上台。

——在三洲会议的前夕，卡斯特罗向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堡垒人民中国发动恶毒的攻击。他把贸易问题，具体地来说就是大米问题作为攻击的借口，中国外贸部发言人进行了辟谣并详细地反驳了卡斯特罗关于这个问题的诽谤。用事实说明了，和古巴总理的非难相反，中国 1966 年向古巴输出的大米超过 1962 年、1963 年的输出额，而和 1964 年的输出量大致相等。

卡斯特罗后来也承认，大米问题只不过是借口。卡斯特罗不可告人的目的是，一方面在本国人民面前为古巴采用修正主义技术官僚建议的措施产生的经济困难辩护，把困难的责任推给曾一贯给予古巴兄弟般的无私的和国际主义的各方面大量援助的中国同志，另一方面，在这个时候攻击中国，是为了在三洲会议上孤立中国，使非马列主义的运动守中立，让苏修的理论通行无阻。

接着，1966 年 2 月 7 日，古巴总理更加猛烈地攻击人民中国，诬赖中国“颠覆”古巴政府，实行“讹诈、压力和扼杀，以及海盗、压迫和捣乱的卑劣手法”。另外他还攻击了革命人民的伟大舵手、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伟大领袖，马、恩、列、斯理论著作的天才继承人毛泽东同志，指责他“自奉为神明”、“搞个人迷信”，并大肆漫骂。

卡斯特罗为什么要搞欺骗宣传，假革命的夸夸其谈？对此智利的马列主义同志们有个正确有力的剖析。智利革命共产党机关报《斯巴达克报》的一篇文章分析了卡斯特罗吞吞吐吐软弱无力地指责苏修支持弗雷政权的一个讲话。文章中说：“在(三洲)会议之后，委共党内的修正主义者和该党坚持武装斗争的党员之间的争执公开暴露了，这就决定了‘法尔孔游击队’的司令道格拉斯·布拉沃被开除……”

“也是在三洲会议之后，由图尔西奥斯指挥的作为“卡斯特罗主义”的体现而出现并得到危修全力支持的危地马拉起义军，给了容·索萨和11月13日运动(按菲德尔和修正主义者的说法，他们是帝国主义代理人)一个声明，主张组成‘革命统一战线’”。

“也是在三洲会议之后，许多力量，包括参加过会议的人，纷纷揭露和抨击卡斯特罗和修正主义搞联合。除了没有参加会议的马列主义共产党(巴西、厄、哥、秘、阿、智、玻等共产党)之外，起来揭露和指责卡斯特的还有：卡米洛·托雷斯神父工作过的哥伦比亚工人、学生、农民运动、墨西哥民族解放运动和阿根廷民族解放运动，委内瑞拉左派革命运动的多数等等……”。

“因而，卡斯特罗最近的讲话反映出拉美许多党和革命组织的思想-政治压力，这些党和组织在逐步否定修正主义，反对与修正主义谅解……卡斯特罗害怕在大陆的革命力量中失去一切影响，陷于孤立。为了保持残有的一点革命威望，煞费苦心地在我们所评论的那次讲话中攻击一番……”。

“卡斯特罗……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来详细阐明他的立场和思想。他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假革命者是帝国主义的同盟者”，但是，他自己却决然联合这些假革命者，并积极地为他们效劳来分裂和削弱大陆的革命运动。他应该在思想上对自己联合帝国主义同盟者的做法作一个解释，并应该更强烈地斥责这些帝国主义的工具。如果他不是那样做的话，那就说明了他与假革命者紧密勾搭，我们就无法相信他那些偶尔的指责是真诚的。”

卡斯特的假革命欺骗宣传首先是他自己感兴趣。但是，也使苏联修正主义者感兴趣，虽然看来似乎有点奇怪，由于使用了大量的很革命的空话，卡斯特罗和古共似乎是以苏共领导为首的国际修正主义运动中的左翼。那样，给被压迫人民的印象是，可以留在修正主义运动中，不同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反革命集团进行决裂，但还是个“革命者”(当然是在口头上的)；可以反对中国，反对伟大的

中共和世界革命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而不放弃似乎“革命”的立场；也就是说苏修领导人还有可能纠正他们的立场，因为，他们和卡斯特罗式的“革命者”似乎还不是极不相容，因此可以认为苏联领导人虽然已陷入修正主义，但到底还不曾堕落到马列主义者所说的那种程度。此外，以“极革命”的面目出现的卡斯特罗修正主义同马列主义党作斗争，能比公然采取和平主义立场的修正主义来得更有效，因为公开的修正主义在革命人士和反帝人士中已是无人搭理的货色。

也还有另一些因素促使卡斯特罗对苏修及其最死心蹋地的追随者某些太不像话的表现偶尔提出指责。这些因素有：卡斯特罗班子的内部矛盾；古苏之间在经济上发生的争执和矛盾，卡斯特罗利用表面上的政治分歧作为政治反讹诈的武器来取得苏联的更大援助，许多曾在山上参加过反巴蒂斯塔战斗，而卡斯特罗仍需要依靠的共产党干部中残有一定程度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浪漫主义，等等.....

此外，我们应该反驳和揭露卡斯特罗及其仆从散布的关于武装斗争的小资产阶级的错误论点，这些论点是违背由毛泽东同志发展和实践的人民战争的马列主义思想的。卡斯特的看法是：在拉美国家中不需要建立一个马列主义的党。建立一些游击中心就够了，尽管最初受到农民的冷遇以至敌视，它们必将逐步得到发展。党将在武装斗争的过程中或在掌握政权之后出现。因此，所有拉美国家的当前任务是开始在山上建立武装队伍。这些看法是根本错误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极其有害的。

列宁说：“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时刻都一定要进行冲击，实行起义。这是胡说八道。要实行成功的起义，必须进行长期的、精细的、顽强的、牺牲巨大的准备工作。”同时：列宁在驳斥修正主义的和平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冒险主义时说，“毫无疑问，没有这一特征，没有革命暴力，无产阶级就不能胜利。但同样毫无疑问，只有在革命发展的一定阶段，只有在一定的特殊的条件下，革命的暴力才是必要和当然的革命手段。而组织无产阶级群众，组织劳动人民却始终是革命深刻得多的经常的特点，始终是革命胜利的条件，把千百万劳动群众组织起来，这是革命最有利的条件，这是革命胜利最深的泉源。”“我们认为，只有群众亲自.....去演出的事件，才能够起到真正重大的“鼓动的”（激动人心的）作用，并且不仅仅是激动人心的，而且是（这重要得多）起教育的作用。我们认为，要起到这种激励人心和有教育意义的作用，就是成百地暗杀沙皇也根本无济于事，这只能靠成千上万的工人参加集会，讨论他们的切身利益和政治同这些利益的联系.....”毛泽东同志说：在许多时候，群众在客观上虽然有了某种改革的带要，



但在他们的主观上还没有这种觉悟，还不愿实行改革，我们就要耐心等待；直到经过我们的工作，群众的多数有了觉悟，有了决心，自愿实行改革，才去实行这种改革，否则就会脱离群众。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所以，毛泽东同志的人民战争的思想与卡斯特罗的游击主义学说毫无共同之处。按照毛泽东思想，人民战争是在人民群众已被马列主义的党教育和组织起来，在这个党已奠定了工农联盟的基础的条件下由人民群众自己进行的战争。

拥护卡斯特罗游击主义学说的人会问：那么，古巴革命怎么会取得胜利的呢？其原因有二点。

第一点是，虽然古巴革命取得了胜利，但是，它不是由于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而是我们早已指出过的那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美帝国主义在最后一刻扔掉了它的傀儡巴蒂斯塔，满以为可以通过压力和讹诈使卡斯特罗及其追随者屈服，因为过去拉美的资产阶级民主派领导人对这种压力和讹诈几乎总是屈服投降的。美帝国主义的如意算盘没有太多充分根据，因为卡斯特罗需要依靠人民，比他还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所设想的来得更迫切。因为，正是美帝的压力，迫使古巴革命的领导人把眼光转向社会主义国家。

第二点原因与前一点有关联，在五十年代末期，帝国主义在拉美的政策是，用亲帝的假民主政权来替换声誉败坏的老的专制独裁，它对当时还未过分攻击美帝的卡斯特罗抱有希望，幻想他能领导一个那种形式的政权（如同委内瑞拉的贝坦科尔特，秘鲁的贝朗德·特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胡安·博什等“反帝人士”一样）。今天，美帝的策略变了。它的新政策——约翰逊政策——是，支持现政权，或者是换上更赤裸裸反动的军事独裁。必要时，也使用武装入侵的手段，例如 1965 年 4 月对圣多明各就是这样，镇压了由资产阶级护宪派卡马诺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帝国主义已在那些国家中建立了一整套政治和军事干涉的天罗地网。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革命再也不可能取得胜利。只有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马列主义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议论卡斯特罗主义，并在人民群众面前揭露它，首先是为了从古巴革命的痛苦经验吸取教训，这场革命是被领导革命的人自己背叛了。《工人先锋报》1966 年 3 月第 11 期上已阐明了古巴革命失败的基本教训。应该指出的二点教训是：在

反帝的民族主义革命中，需要一个马列主义先锋党的领导；需要在意识形态中进行持久和无情的反修斗争，这是取得革命胜利所绝对必要的条件。

对于拥护“卡斯特罗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激进集团(那些把老的卡斯特罗革命主义和新卡斯特罗主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变种——合而为一的集团，我们的态度当然应该是灵活而慎重的。我们并不一概拒绝在一定条件下同他们取得协议或与他们采取共同行动的一切可能性(包括不拒绝这些集团参加我们党所主张的革命的民族民主阵线——当组成该阵线的条件已成熟的时候——因为那绝不是一天两天的任务)，但同时我们应该在思想领域中与他们的严重错误进行有力的斗争，应该抵制他们企图散布的糊涂思想，应该揭露他们的本来面目：伪装“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以无产阶级代表自居的小资产阶级激进集团。也有一些号称卡斯特罗主义的集团其实只不过是托洛茨基派或修正主义的分枝，像这样的人，当然绝不可能成为我们的同盟者。

但是，不管怎样，这些集团的重要性和影响是不足道的，它们的存在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问题。因此，我们绝不应该为了取得同这些集团的团结而不去揭露卡斯特罗的修正主义政策，绝不能以放弃马列主义的思想斗争和放弃坚持无产阶级先锋党的独立立场的代价来换取团结。